

# 论汉画像石文字榜题和题记\*

欧阳摩一

(南京博物院 江苏南京 210016)

Among more than 10,000 pieces of Han discovered in China up to now, over 250 pieces of them are inscribed with characters, and most of them belong to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 of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content of craved stone is divided into the announcement topic and the prefatory remarks, which has provided the first material for the study of history, culture and custom in Han Dynasty.

Keywords: Han Dynasty Craved Stones Characters Announcement Topic Prefatory Remarks

**内容提要** 在迄今全国发现的约1万多件(处)画像石中,刻有文字者约250多件(处),其时代多为东汉中期。画像石文字内容分榜题和题记两类,内容丰富,为研究汉代历史、文化、风俗等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关键词** 汉代 画像石 榜题 题记

**中图分类号** K877.4 **文献标识码** A

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艺苑中的一朵奇妍之葩,其画像内容丰富生动,文字古拙道美,主要用于墓室、石祠、石阙等墓葬建筑及石棺、石函等墓内载体的装饰。画像石产生于西汉,兴盛于东汉,衰落于东汉末年,魏晋以后罕见。19世纪末期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山东、江苏、河南、陕西、山西、四川、重庆等地发现了约1万多块画像石,主要是东汉中期,约占画像石总数的90%以上;其中有文字者约250多件(处),主要也是东汉中期,也约占画像石文字总数的90%左右。

画像石文字多出于画像石分布第一区,即山东及周边的苏北、皖北等地<sup>[1]</sup>。该地区是两汉时期经济、文化极为繁兴的区域之一,画像石产生年代最早(西汉早中期),数量最大,延续时间长,内容极为丰富。该区域画像石的文字题记也发现最多,计140余件(处),其中纪年者有80余件(处),最早为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此外,四川、陕西、河南等地也发现为数不少的画像石文字,且各有特色,有的晚至蜀汉及魏晋时期。

它们为研究汉画像石的断代分期提供了标尺性的依据。汉画像石文字主要分榜题和题记两大类,其内容透露出大量的汉代历史、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信息,弥补了史载之不足,有很高的历史价值。本文拟对榜题和题记的定义、内容、形式等作讨论,阙误之处,敬祈方家学者教正。

## 一 榜题

### 1. 什么是榜题

榜题是刻于画像旁介绍及赞颂具体人物、事物名称、内容的文字。字数较少,一般两三字,多数数十字。榜题可帮助读者确知画像的内容,减少无谓的瞎猜。刻有榜题的画像石发现不少,约80多件,其中以山东嘉祥武氏祠、沂南汉画像石墓,四川简阳三号石棺等为代表。

画像石上的榜题,早在宋代就引起金石学家的注意。赵明诚说:“武氏有数墓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sup>[2]</sup>由赵明诚所述可知,榜题分两类:一类是“题记姓名”,可简称“题名”或“题”,

收稿日期 2007-04-16

\* 本文为2001年度国家文博系统人文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汉画像石上文字的研究》系列论文之一(项目编号2001010)。

一般两三字,长者五六字。如“西王母”、“孔子”、“老子”、“吴王”等等。一类则是“赞”。此为中国古代文体的一种,褒贬、评论人物和事物,但以赞美为主。刘勰《文心雕龙·颂赞》云:“至相如属笔,始赞荆轲,及迁史固书,托赞褒贬”;“赞之义兼美恶,亦犹颂之变耳。”萧统《文选序》:“美终则诤发,图象则赞兴。”画像石上的“赞”,文字精雅,一般十余字,长者二三十字,多为4字一句。如武梁祠西壁画像第二层刻历代帝王像,其旁各有榜题,其中伏羲、女媧像左16字:“伏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另外,还有少数是题、赞合一的榜题,如武梁祠西壁画像第三层刻孝子故事4幅,其中闵子骞后母故事像右上刻8字:“子骞后母弟”、“子骞父”;左上刻19字:“闵子骞与假母居,爱有偏移,子骞衣寒,御车失榘。”

### 2. 榜题的形式

(1)在物像旁凸起一个竖向的长方形(少数不太规则),其上阴刻文字。这是榜题的主要形式,以嘉祥武氏祠为代表,另外还有山东嘉祥钩骑四人画像、齐山孔子见老子画像、滕县苍子管仲画像,四川新津赵氏画像等等;

(2)直接刻于浅浮雕的物像身上。如嘉祥五老洼楼阁人物画像,其厅堂内坐一身材高大的官员,身上刻“故太守”三字,其对面刻二人持笏躬身,一人身上刻“丁卯”,一人身上刻“十一月”。

(3)直接刻于物像旁边或下部的石面(多磨平,有的刻有底纹)上。如安徽亳州董园二号墓,二墓门上分别阴刻龙、虎,其旁各刻阴文“神龙”、“白虎”。

(4)在物像旁的平地或底纹上以阴线刻长方形框,内刻文字。如嘉祥纸坊孔子见老子画像、周公辅成王画像,江苏宝应孔子见老子画像等。

(5)为第一、四两种形式的合体,即在凸起的长方形上,再以阴线刻长方形边框。这种形式也不多见,其代表者为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12处榜题。

有少数榜题可能因时间紧等原因,而有榜无题,即“榜”内没有刻上文字,如沂南汉画像石墓等。

### 3. 榜题的内容

(1)神话及历史人物。如西王母、伏羲、女媧、祝融、神农氏、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夏禹、夏桀、皋陶、关龙胜、汤王、汤妃、文王、文王十子图、孔门弟子、吴王、楚王、秦王、孙武、苏武等。其中尤以西王母、伏羲、女媧等画像为多,广泛地出现于山东、四川、河南等全国各地的画像石上。

(2)历史故事。可分忠、孝、美德妇女、侠义、其它等几类。忠者如蔺相如完璧归赵、周公辅成王

等;孝者如闵子骞后母、老莱子斑衣娱亲、丁兰刻木人、伯榆伤亲、邢渠哺父等;具贞节义烈等美德之妇女者,如鲁秋胡戏妻、梁节姑姊、齐义继母、京师节女等;侠义如公孙杵臼与程婴、曹沫刺桓公、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等;其它如苍颉造字、柳下惠坐怀不乱、胡汉战争、伯乐相马、孔子见老子等。实际的故事画像更多一点(如二桃杀三士等即没有榜题),但有榜题的故事画像即上述50多个,其中有不少故事重复多次出现(多集中于画像石分布第一区);有的故事如孔子见老子、葵咬赵盾、董永侍父等表现仁义忠孝等儒家思想的故事,广泛出现于全国各地画像石上。山东嘉祥武梁祠的人物和历史故事的画像最多(计有43幅),且每幅画像上都有榜题,几乎完整地表现和赞颂了儒家以仁为核心、以忠孝节义为主要内涵的道德准则。

(3)车骑出行。榜题有:此丞相车、君车、令车、主簿车、主记车、尉卿车、尉卿车马、太尉车、道吏车、五官掾车、辎车、庐行亭车、行亭、司徒、司空、大鸿胪、駟使、令、相、二千石、主簿、主记、主掾、贼曹、游徼、门下功曹、门下游徼、门下贼曹、调间二人、此骑吏、此君车马、此亭长、君为市掾时、君为郎中时、为督邮时、主簿、二卒、行亭掾、钩骑四人、骑苍头、□侯、□尉卿、□门亭长迎、骑将军、门下小吏、骑吏、执戟、执爰、前驱、封人等。

关于车骑出行画像,信立祥先生经考证后认为有两种:一种是表现墓(祠)主生前最荣耀经历的车马出行图,墓主或出行队伍的主人公(如武氏祠前石室出行图中即标明“君为市掾时”等)或是仅以随从身份参加了出行;另一种是表现墓主由地下墓室赴墓地祠堂途中或刚到达祠堂的车马出行图,如画像石上常见的前后有迎送者的出行图<sup>[3]</sup>。信先生此论甚为允当。值得一提的是,不可机械地依凭榜题文字区分这两种出行图。同样的榜题(如“主簿”、“行亭”等)可分别出现于这两种出行图中,这要结合祠堂或墓室及画像本身具体情况判定。另外,江苏泗洪人物画像等,只刻人物而未刻车辆,但榜题又与车辆出行中的榜题内容类似<sup>[4]</sup>。此处应不是表现墓主在部属陪侍下步行去墓上祠堂接受祭祀,而是表明墓主生前地位的高贵,墓主或为画像中的人物,或为其中的一员。

(4)其他人物。如胡王、胡将军、守炳吏、丑、胡奴门、□□(守门)吏、门大夫、武士、力士等。其中,“胡王”、“胡将军”等刻于胡汉交战图上;“胡奴门”等刻于祠门或墓门石上,有辟除邪恶、为墓主守卫灵魂之意。

(5)祥瑞图像。如神鼎、萸荚、狼井、六足兽、比目鱼、比肩兽、比翼鸟、玄圭、木连理、赤黑、玉英、

玉马、泽马、白马、巨昀、银瓮、白鱼、凤凰、龙(包括交龙、神龙等)、白鹿、嘉禾、甘露、白虎、朱雀(朱雀)、玄武、麒麟、福德羊及太仓、凤阙、天门、柱铖(神树)、白雉、离利等。这些祥瑞图像具有辟除不祥、驱逐恶鬼、守护墓主的作用。而四川简阳3号石棺上的“天门”、“凤阙”、“柱铖”神树及“先(仙)人博”、“先(仙)人骑”等画像和榜题,则表达了墓主升仙的愿望<sup>[5]</sup>。祥瑞图像广泛刻于全国各地的画像石上,只是有榜题的祥瑞图像主要出现于山东嘉祥的武氏祠,少数出于四川、安徽、甘肃等地。

⑥在墓主画像旁标明墓主人的姓名,这种情况不多。如四川新津赵买、赵掾崖墓,墓门上刻父子二人并坐,各有榜题,右为“南常赵买字未定”,左为“贤孺赵掾字元公”;新津赵义文崖墓,墓门上刻一妇人端坐,右侧榜题为“孝妇赵夫人字义文”。可知此二墓为赵氏家族墓。河南南阳许阿瞿画像,榜题为“许阿瞿”,显为墓主本人。

#### 4. 榜题文字的时代和分布地区

榜题文字多为东汉中期,尤以晚期为多。

榜题中,赞及题、赞合一者,只发现于嘉祥武氏祠,在其它地区未有发现,题名也主要发现于山东及苏北等周边地区,此外在河南、四川、甘肃等地也有少量发现。

榜题主要发现于画像石分布第一区,第一区的榜题又集中于山东,而山东的榜题文字又集中于武氏祠。据统计,武氏祠画像石文字共1168字,除石阙铭文91字外,榜题文字约1069字,为汉画像石榜题文字发现最为集中者。但其榜题分布不匀,以武梁石室最多,计525字,占武氏祠榜题文字的一半<sup>[6]</sup>。

#### 二 题记文字

画像石上的题记,主要是指刻于墓上祠堂、墓阙和墓室画像石上,记载祠主(墓主)姓名、身份、生平事迹、卒葬时间、营造时间等内容的文字(为墓志早期形态,其中少数干脆就是较成熟的墓志,如南阳出土的许阿瞿墓志等)。题记文字多少不等,少则十几字,多则几百字;多发现于东汉,有时代越晚字数越多、内容越丰富之趋势。

嵩山太室、启母、少室三石阙为庙前神道阙,其上刻有题记文字,包括介绍三阙营造缘由、主持及承办营造的官吏及赞语等<sup>[7]</sup>;四川昭觉光和四年石表(81年)上也刻有文字(约400字)。此表为邛都县上渚、安斯二乡十四里群众所立,主要记载东汉光和四年,越嵩郡太守任命苏示县某乡有秩冯佑为邛都县“安斯乡有秩”,还有免除上渚、安斯二乡赋役及有关当地乡里组织情况等内容<sup>[8]</sup>。此二类阙、表题记内容与墓阙题记不类,且数量甚

少,未列入本节讨论范围。

题记与榜题的区别在于:榜题是介绍画像本身的,而题记则是介绍祠主(墓主)及祠堂、墓阙、墓室的。

题记也与榜题一样,有长有短,有详有略。简略者有四五字到三四十字不等。如安徽淮北墓门题记:“建初四年”;四川乐山尹武孙墓题记:“尹武孙莫(墓)”;四川成都金牛区汉墓:“中平四年十二月十三日造”,“梁离狐茂陵任君元升神门”;等等。简略题记时间持续长,从西汉晚期到蜀汉时期均有;范围广泛,举凡山东、苏北、皖北、河南、陕北、晋西北、四川、重庆等地,皆有发现,且数量众多,为画像石题记的主要形式。

文字长者在五六十字以上,有的长达百余字或数百字。其中著名者有:山东鱼台文叔阳祠堂题记(70多字),嘉祥武氏墓群石阙题记(63字),四川成都市郊王君平阙永寿元年题记(120多字),河南南阳许阿瞿画像题记(136字),江苏邳州缪宇墓题记(约100多字),邳州燕子埠永寿二年题记(230多字),山东永和四年祠堂题记(290多字),苍山元嘉元年题记(327字),东阿芟他君祠堂石柱题记(430字)等。而以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为最长,达460字。此类题记多产生于东汉中期,主要发现于山东、苏北等地,少数发现于河南、四川、陕北、晋西北等地则没有发现。这种现象与画像石繁兴程度成正比。画像石发展水平越高,越是繁兴,长篇题记发现得也越多,文字也越长,内容涉及的面也越广。两汉时的大山东地区,经济发达,文教昌盛,走在全国最前列,所以长篇题记集中于该地区也就不奇怪了。

题记的内容,简短者一般包括祠主(墓主)姓名、卒葬年月等;长篇题记在此基础上,又增加了堂阙或墓室营造时间、祠主(墓主)生平事迹、德行、孝子名、孝子思亲、祭语(或吉语)等(下文有较详细的介绍),内容比前者大大地丰富了。

题记文字一般刻于画像旁的石面上,或刻于画像石墓内单独的石面上(即文字刻石),但也有刻于画面上的阙座和碑身上的(多出于皖北)。如:安徽灵璧阳嘉三年建鼓画像(134年),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为宴饮图,正厅、廊房等建筑的右侧立一阙,阙座刻题记:“阳嘉三年八月廿四丙……”宿县胡元壬祠堂题记(171年):宿县褚兰镇曾出土两座画像石墓,其中2号墓祠堂北壁画像石的正中,刻有一方凸形的小墓碑,四周起边框,行间有界格。碑顶有碑额,七字三行,文曰:“辟阳胡元壬□(之?)墓”。碑文计9行,每行字数不等,多者22字,少者15字<sup>[9]</sup>。

有的题刻文字还以印章等形式表现。如安徽濉溪太尉府门画像,其两侧刻一对子母阙,正中位置刻一田字格汉印样式,内刻篆书“太尉府门”四字,这在安徽乃至全国均属罕见<sup>[10]</sup>。

题记文字一般为石刻,但也有墨书的,多发现于陕北和晋西北。如陕西绥德黄家塔1号墓,前室后壁中柱石面上写有12字,墨迹较清晰,中有数字磨毁。文为“汉羽林郎□□□□□室宅”。神木大保当画像石墓,其左门从上至下刻朱雀、铺首衔环、青龙,龙的胯下有墨书“青龙在左”四字;右门上、中部图案同左门,最下端刻白虎,虎的胯下有墨书“白虎在右”四字。山西离石马茂庄2号墓,该墓有6处隶书墨迹,第10、15、16、18、25、28画像石分别书“户南”、“东壁北柱”、“西壁北柱”、“西壁北头柱”、“东壁户南柱”、“东壁南头柱”。除15号画像石以外,所标的墓中方位与实际位置相符。离石马茂庄14号墓,除左门框石右侧边缘处有竖行刻铭外,左墓门右边缘残留墨书题记:“熹平四年六月”;右墓门右边残留墨书痕迹“暨□”。从墨书题记看,当时画像石上的题记、榜题,多为先书后刻的,有的因为时间等原因,墨书后未刻,如上述“汉羽林郎□□□□□室宅”即是。还有一类墨书是做记号或标明方位的,此类题记写后不必刻。

### 三 画像石题记与墓志

“刻石之文收之冢,称之墓志。”<sup>[11]</sup>墓志是放在死者墓中记有死者官衔、姓名、籍贯、生平、卒葬时间等内容的石刻。除具有书法艺术价值外,可为墓葬断代之确证,同时补史书记载之不足。

有学者认为:东汉始有相当于墓志的墓石。东汉时,碑刻大兴,其内容多有与墓志相类者。至曹魏两晋,因魏武帝、晋武帝禁立碑,于是转碑为墓志埋藏于地下。墓志大盛于北朝,尤以北魏元氏墓志最多,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有刻石<sup>[12]</sup>。南北朝以后,方形墓志成为定制,下底上盖,盖刻标题,底刻志铭,前志后铭。现知标明为“墓志铭”的方形墓志,以南朝宋大明八年(464年)刘怀民墓志铭为最早,其后还有明县熹墓志(474年)等。

赵超先生认为,墓志的源头可追溯到秦汉。秦代的志墓瓦文,记载了修建陵墓死者的籍贯、姓名、身份等,已具备标志墓中死者的性质,开后世墓志之先声。而汉代的告地状、刑徒砖、铭旌、画像石题记、墓门题记、镇墓券、墓碑等,也具备志墓性质,可谓墓志之先源。画像石题记中出现了墓主的姓名籍贯,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的附属品存在,出现得不普遍,但开创了在墓室中安放石质铭记的先例。他认为,正式的墓志应具备下列几个条件:(1)有固定的形制;(2)有贵用的文体或行文格式;(3)

埋于墓中,起到标志墓主身分及家世的作用。他把墓志产生和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1)滥觞期:自秦代至东汉末期,存在志墓风习,但没有形成固定的墓志形式;(2)转化期:魏晋至南北朝初年,墓志开始正式形成,但还常以小碑或柩铭的形式出现,变化较多,“墓志”名称尚未使用;(3)定型期:南北朝时期,“墓志”名称正式出现,形制和文体相对固定,并在当时墓葬中普遍采用<sup>[13]</sup>。

赵先生所言,笔者大致赞同,所异者有二:

(一)赵先生认为画像石题记出现得不普遍。事实上,画像石题记数量较大,共发现250多件,其中具墓志性质的题记约200件左右,其中多为东汉中晚期作品,并广泛发现于山东、江苏、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发现得较为普遍。

(二)笔者认为,应把墓志形成期与墓志铭形成期区分开。墓志铭(即赵先生所说“定型”墓志或“正式的墓志”,上盖下底,前志后铭)形成于南北朝,这无异议,但赵先生说墓志在魏晋至南北朝初年开始正式形成,这个时期定得偏晚了。从汉画像石题记的角度看,至东汉中晚期(至迟到东汉晚期),已形成较成熟的墓志。理由除上述画像石题记数量多、发现较普遍外,还有二:一是这些题记除阙铭和石表铭外,绝大多数位于墓中,起到标明墓主身份的作用。二是后世墓志中的各项要素,如姓名、身份、生平、丧葬日期等,在东汉中晚期的画像石题记中均已具备,文字较长,有的长达400多字;有的题记中甚至还出现了后世墓志铭中“铭”的雏形。

画像石题记文字最早出现于西汉晚期,已具墓志性质,实为墓志雏形,文字少,记载内容简单,一般只刻成墓年代或葬期、墓主等内容。如:山东临沂平邑河平三年题记(公元前26年),画面刻单柱屋,柱之右、左刻两行题记:“河平三年八月丁亥”,“平邑侯里蔗孝禹”。山东曲阜东安汉里画像题记(公元前26年):“山鲁市东安汉里禹石也”,“河平三年八月丁□汉里禹堧(墓)”<sup>[14]</sup>。

东汉早期,题记文字渐长,内容渐多,包括卒、葬年月(有的刻建墓或立祠堂年月,有的还精确到日)、墓室或祠堂造价、孝子名、工匠名,及简单的吉祥语或祭语等。各题记内容不一(包含上述内容中的几项或大部),长短不等。如:东汉天凤三年(16年)的山东汶上路公食堂题记:“□□元年二月廿日□□□□□□公昆弟□天凤三年立食堂,路公治严氏春秋不踰”。永平四年(61年)的江苏铜山永平四年题记:“建武十八年腊月子日□,永平四年正月为石室值五千泉上莒少郎所为,后子孙皆忌子。”山东肥城栾镇村祠堂题记(83年):“建初八年八月成,孝子张文思哭父而礼,石值三

千,王次作,勿败□”;

到东汉中外晚期,题记文字更长(有的长达400余字),内容更多。除上述内容外,又加上墓主人官职、姓名、功名、生平事迹等,有的加上死者品性德行、事迹、家族情况及画像介绍等,与后世成熟的墓志已无大的差别,墓志至此已基本形成。如:

山东永平四年题记(139年),长290多字,内容丰富,包括建造祠堂时间、缘由、孝子名、造价、建造匠师、吉语、祭语等;山东苍山元嘉元年题记(151年),长327字,除墓志该有的主要内容外,该题记还对画像石墓各个部分的画像作诠释和介绍,对我们认识画像石内容大有裨益;山东东阿芑他君祠堂石柱题记(154年),三面刻画,一面题字。石柱上题额:“东郡厥县东阿西乡常吉里芑他君石祠堂”。题记计430多字,为画像石题记中最长的两块之一。举凡父母得病去世、孝子起立坟墓、祠堂及匠师、石料来源、吉语等,无不详尽。此题记有额,是碑的形式,却埋在墓内,大约因为芑他君官做得不大,制度上不许可他立碑,于是他的子孙就在墓门石柱上刻了这段题字。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祠堂题记(157年),长达460多字,为迄今发现画像石题记中文字最长的一块。内容与芑他君祠堂题记相类,有的更详细,该题记中还反映东汉晚期山东农民起义的情况,为研究、印证当时的农民起义提供了新的资料。

东汉晚期,有的画像石题记为韵文,4字一句,语气沉痛,音韵谐和优美。如河南南阳许阿瞿墓志(170年):“惟汉建宁,号政三年,三月戊午,甲寅中旬。痛哉可哀,许阿瞿身,年甫五岁,去离世荣。遂就长夜,不见日星,神灵独处,下归窈冥。永与家绝,岂复望颜,谒见先祖,念子营营。三增仗火,皆往吊亲。瞿不识之,啼泣东西,久乃随逐(逝),当时复迁。父之与母,感□□□,□子五月,不□晚甘。羸劣瘦□,投财连(联)篇(翩),冀子长哉,□□□□。□□□此,□□土尘,立起□归(?),以快往人。”同为东汉晚期的四川郫县墓门题记、四川成都市郊王君平阙永寿三年题记(157年)等,也是多为4字一句的韵文。可见,在东汉晚期在画像石题记中出现了韵文,而这些韵文实为魏晋以后墓志铭中“铭”的先声。

墓志性质的画像石题记,以山东及周边地区发现最多,文字也最长;四川、重庆、河南等地次之,陕北、晋西北等地为最简。这是与当地经济、文化、礼俗等发展程度密切相关且呈正比的。

除画像石题记外,东汉时期的墓志(均不自称墓志)还有:左将军特进胶东侯贾武仲及夫人马姜墓志(64年)、姚孝经砖志(73年)、河南梁东安乐

肥君致之碑(169年)、功曹祖钦墓志(184年)等。其中有的碑出于墓中,实为墓志性质,如河南梁东安乐肥君致之碑,志文19行,满行29字,碑身長98、宽48厘米,1991年出于偃师县南蔡庄东汉墓。其原因可能与山东东阿芑他君祠堂题记相同,可能因墓主官职不高,制度上不准许立碑,而只好埋于墓中了。看来早在东汉晚期,就有石碑埋于地下当作墓志了<sup>[15]</sup>。

由上述讨论可知,墓志及墓志铭的发展大致经过了这样几个阶段:一是墓志雏形期,从秦代至东汉早期;二是墓志形成期,从东汉中外晚期至魏晋及南北朝初年;三是墓志铭形成期,为南北朝时期;四是墓志铭延续发展期,隋唐以后至民国。

附记 文中所引画像石资料,见于上述主要参考资料,并可参见本课题系列论文之一《画像石文字的发展和整理》

[1]信立祥等学者把画像石分为五个分布区,第一区为山东、苏北、皖北,第二区为以南阳为中心的豫南和鄂北地区,第三区为陕北、晋西北,第四区为四川、重庆、滇北,第五区为河南洛阳等地。此分区法受到画像石界较广泛的认同。

[2]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九。

[3]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四章第三节“幽明两界的车马出行图”,文物出版社2000年。

[4]尤振尧:《江苏泗洪曹庙东汉画像石》,《文物》1986年第4期。

[5]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第281~285页。

[6]骆承烈、朱锡禄:《武氏墓群石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编印,1979年。

[7]吕品:《中岳汉三阙》,文物出版社1990年。

[8]吉木布初、关荣华:《四川昭觉县发现东汉石表和石阙残石》,《考古》1987年第5期;胡顺利:《昭觉县东汉石表考释的几点辨正》,《四川文物》1988年第3期。

[9]王步毅:《安徽宿县褚兰汉画像石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王步毅:《褚兰汉画像石及有关物像的认识》,《中原文物》1991年第3期。

[10]另见朱永德:《“太尉府门”画像石与东汉名臣徐防》,《中国文物报》2004年5月21日。

[11]清·叶昌炽:《锴石》

[12]王壮弘、马成名编纂:《汉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

[13]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之“前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14]刘正成主编:《中国书法鉴赏大辞典》,大地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15]洛阳市文物管理局、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编:《洛阳出土墓志目录》,朝华出版社2001年。